

英国华人状况调查 <<

宋 荔^①

一、引言

（一）在英华人

英国华人群体的成员很少出现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英国的华人群体在某些情况下被描述为“看不见的少数民族”^②。这一表述明确指出英国的华人群体缺乏影响力。在为数不多的关于英国华人的研究文献中，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组研究试图描述英国华人群体的一般人口概况和空间分布。比如卢克（Luk）着重研究 1981 年到 2001 年英国的华人移民情况及其空间分布。^③ 陈和克里斯丁·陈（Chan and Christine Chan）认为在英国的华人迅速增加，分布

①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② Halpin Tony, “Driven Chinese Students are Top of the Class”, *The Times (United Kingdom)*, 28 February 2004.

③ Wai-ki Luk, “Chinese Ethnic Settlements in Britain: Spatial Meanings of an Orderly Distribution, 1981-2001”,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5, No. 4, 2009, pp. 575-599.

广泛。这些研究是从宏观视角观察华人群体的。^①

最近的研究介绍了英国华人社会的经济成就，尤其是在食品行业和家族企业方面的成就。^② 其他学者致力于研究英国华人的健康理念、需求和心理调适。^③ 这些重要的研究描述了原籍香港或福建的第一代中国移民的经历与生活，而第三组研究者则主要关注年轻的第二代英籍华人的教育、就业、身份与融合问题。^④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即一些研究者已经对自 21 世纪起涌向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产生兴趣。^⑤ 然而，鲜有人研究那些毕业后没有回中国而是在英国就业或经商的中国学生。此外，更少有人探讨就职于中国公司在英国的子公司或办事处的华人，更遑论探讨他们如何表征自己的身份了。在英国华人群体这个“看不见的”大群体中，这些华人形成一个甚至更加“看不见”的次群体。

（二）在英大陆华人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英国的华人群体是异质性的，成员讲不同的方言，如

① Yiu Man Chan and Christine Chan, “The Chinese in Britai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23, Issue 1, 1997, pp. 123-131.

②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Gordon C.K.Cheung. “Family Firms, Networks and ‘Ethnic Enterprise’: Chinese Food Industry in Britain”, *East Asia*, Vol. 26, 2009, pp. 133-157.

③ 参见 Ruby C.M. Chau, Sam W.K. Yu, and Cam T.L. Tran,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e Health Needs of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 and Developing Cultural Sensitive Service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Mar. 2011, pp.1-19; Ken Laidlaw, DaHua Wang, Claudia Coelho, and Mick Power, “Attitudes to Ageing and Expectations for Filial Piety across Chinese and British Cultures: A Pilot Exploratory Evaluation”,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Vol. 14, Issue 3, 2010, pp. 283-292.

④ 参见 Becky Francis and Louise Archer, “British-Chinese Pupils’ and Parents’ Constructions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 31, No. 1, 2005, pp. 89-108.

⑤ 参见 Haoda Sun and John T.E. Richardson, “Perceptions of Quality and Approaches to Study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British Postgraduate Students at Six British Business Schools”, *High Education*, Vol. 63, 2012, pp. 299-316.

粤语、客家话和普通话。^① 华人群体的多元化是由于阶层和代际差异造成的。因此，用统一的视角来看英国的华人群体意义不大。研究华人社会需要我们分别对待每个群体，避免将一个群体的情况推及整个华人群体。过去的研究表明，中国移民倾向于在中式餐饮店和中式外卖店工作。^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发现并不适用于目前英国的所有华人群体。现在，年轻的成年华人正在进入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其他行业和部门，他们的就职行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③ 来自中国大陆大城市的移民也进入了英国就业市场的专业领域。

这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跟早期的华人移民不同，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素质和语言能力方面。以前来自福建或广东的移民大多经济条件较差且集中在餐饮业，而这一批华人经济条件较好，同时他们到英国是为了求学或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早期移民到英国之前几乎不会讲英语，而这一批海外华人则在到英国时就已经掌握了英语。他们具备社交生活所需的良好语言能力，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加自如地与英国主流社会交流，拥有当地的朋友。

为避免因用词而引起争论，本文将这一批华人移民视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新一批在英华人。更具体地说，他们是有技能的华人移民，在英国工作、教学或经商，大约 2000 年左右或之后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英国。

二、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的主要理论是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社会身份复杂性是一个相对

① 参见 Gregor Benton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② Sam Yu, “Adaptation and Tradition in the Pursuit of Good Health: Chinese People in the UK - the Implications for Ethnic-sensi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49, No. 6, 2006, pp. 757-766.

③ Mary Pang,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Young Chinese Adults in the British Labour Market”, *Personnel Review*, Vol. 28, Issue 1, 1999, pp. 41-57.

较新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结构，是指“个体主观上组合自己各种内群体身份的一种方式，以形成对自己多重内群体成员身份或多或少较复杂的认知表征”。^①

（一）多重身份表征的类型

洛卡斯和布瑞伟（Roccas and Brewer）规定了身份结构的四种认知表征，这些身份结构反映了多重内群体之间关系可以得到主观性表征的不同方式。^②具体而言，这四种表征方式是：交集、主导、区分和融合。每种表征的图解参见下面的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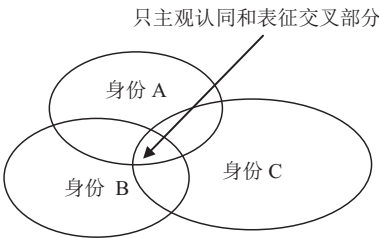


图 1 多重身份的交集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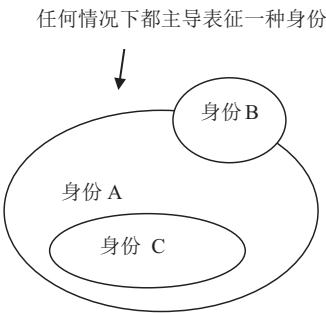


图 2 单一身份的主导表征

^① Sonia Roccas and Marilynn B. Brewer,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6, No. 2, 2002, p.90. 关于社会身份理论的更多阐述，请参见 Marilynn B. Brewer and Kathleen P. Pierce,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Outgroup Toler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1, No. 3, 2005, pp. 428-437; Kevin P. Miller, Marilynn B. Brewer and Nathan L. Arbuckle,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Its Correlates and Antecedents”, *Group Proces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12, No.1, 2009, pp. 79-94; Katharina Schmid et al.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Intergroup Contact, Distinctiveness Threat and Outgroup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5, No.8, 2009, pp.1085-1098; Xin Sufei and Xin Ziqiang,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Theories, Methods and Advanc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0, Issue 3, 2012, pp. 433-442; Maykel Verkuyten and Borja Martinovic,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Immigrants’ Attitude toward the Host Na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8, No. 9, 2012, pp.1165-1177.

^② Ibid., pp.8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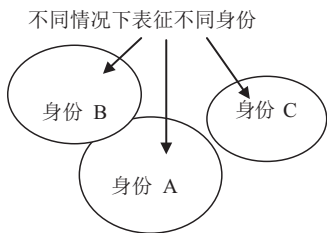


图3 多重身份的区分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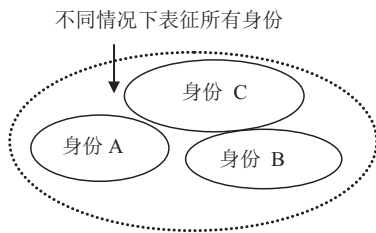


图4 多重身份的融合表征

多重身份的这些结构提供了在面临重叠的内群体和外群体时实现认知平衡的方法，而相互关系则可以在多重交叉的群体身份间建构。^① 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借鉴了之前对认知复杂性水平的概念化方法，将上文讨论的多重社会身份表征模式置于从最不复杂到最复杂的连续体上。施密德和休斯同（Schmid and Hewstone）认为，应将社会身份复杂性视为是连续性的，复杂性从低到高发生变化。因此，四种认知表征方式在这个复杂的连续体上都有一个参照点。^②

低社会身份复杂性意味着多重身份主观地嵌入一种单一的内群体表征，而高复杂性则涉及认可差异化和内群体类别之间的不同。在复杂性的连续体上，复杂性最低的是交集表征，其次是主导表征，主导表征的复杂性低于区分表征与融合表征。区分表征的复杂性更高，而融合则表征着最高层次的包容性和复杂性。

（二）影响多重身份表征的因素

许多研究社会身份复杂性的学者已经指出，有三种因素可影响人们从交集、主导、区分与融合中选择表征方式。它们是：稳定的实验因素、个体属性

① Marilyn B. Brewer and Kathleen P. Pierce,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Outgroup Toler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1, No.3, 2005, pp.428-437.

② Katharina Schmid et al.,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Intergroup Contact, Distinctiveness Threat and Outgroup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5, No. 8, 2009, pp.1085-1098.

和情境因素，前两种因素引起社会身份复杂性方面的稳定长期个体差异，而第三种因素则引起临时性变动。

洛卡斯和布瑞伟指出，生活在相对更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社会中的人更可能通过融合方式来体现其多重身份，而融合则最可能导致对其他群体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①

第二种长期变量是对人的多重社会身份复杂表征具有长期影响的个体属性。个体属性可进一步划分为：个体需要或个体的认知风格与个体的社会化价值观。需要较高闭合性的个体可能倾向于将其内群体看成彼此相似的，他们的社会身份复杂性可能相对较低。此外，确定取向的个体倾向于将多重社会身份表征为单一共同群体，不确定取向的个体可能更愿意寻找会导致社会身份复杂性较高的关于多重身份的信息。^②

个人价值观与社会身份复杂性之间也有关系。洛卡斯和布瑞伟提出，最可能影响复杂社会身份结构可实现性的价值观类型是保守主义和乐于接受变化。重视保守主义和强调权力价值观的个体可能形成简单的社会身份，因此，他们的社会身份复杂性较低；而乐于接受变化的个体则可能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身份复杂性。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通过考量上述个人认知属性和素质来获得其心理特点。

第三类变量是对社会身份复杂性产生短期影响的情境因素。研究社会身份复杂性的学者探讨了四个因素，分别是：独特性、认知负荷、压力和内群体威胁。他们预计，在特定内群体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该群体将在个体的社会身份表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此外，重新认可复杂的社会身份可能比简单的内群体认知需要更强的认知努力和注意，因此，“认知超负荷”^③可能会导致社会身份复杂性暂时降低。

① Sonia Roccas and Marilynn B. Brewer,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6, No. 2, 2002, p. 90.

② Ibid., p.97.

③ Ibid., p.99.

所有这些情境因素均可暂时影响人们的多重身份表征，因此，人们可能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身份表征模式（Roccas and Brewer 1992）。在感觉受到威胁时，社会身份复杂性通常较高的人可能突然表现出较低的社会身份复杂性。这很好地解释了后现代主义派为什么认为身份是流动的和短暂的。

（三）社会身份复杂性的后果

研究者在最近几年才开始高度重视研究个体的群际态度如何受多个内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社会身份复杂性对群际关系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的讨论正是集中在这一方面。

以实证方式探讨社会身份复杂性概念的研究较少，其中一项研究是 2009 年施密德等人开展的。他们的研究考察了身份复杂性在群际冲突情况下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更加差异化和复杂的内群体认知与外群体态度正相关”的主张^①。布瑞伟和皮尔斯（Pierce）于 2005 年以及米勒（Miller）、布瑞伟和阿尔巴蔻（Arbuckle）于 2009 年分别报告了类似的发现。

这些报告以实验数据支撑了洛卡斯和布瑞伟的主张：更高的社会身份复杂性确实与更高的开放性、更高的外群体容忍和更少的群际偏见相关。菲尔库腾和马丁诺维克（Verkuyten and Martinovic）在荷兰进行他们的研究之前，没有研究探讨过移民群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问题。他们的研究考察社会身份复杂性跟穆斯林移民国家认同和其对东道国大多数人态度之间的关系，是首次尝试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他们进行的三项研究表明更低的社会身份复杂性与对其东道国更负面的态度相关，强烈认同其民族和宗教内群体的穆斯林移民比社会身份结构更复杂的移民更倾向于疏远其东道社会。^②

① Katharina Schmid et al.,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Intergroup Contact, Distinctiveness Threat and Outgroup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5, No. 8, 2009, p. 1085.

② Maykel Verkuyten and Borja Martinovic,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Immigrants’ Attitude toward the Host Na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8, No. 9, 2012, pp. 1165-1177.

菲尔库腾和马丁诺维克指出，未来关于社会身份复杂性的研究应探讨其他移民群体在其他东道国的身份问题。研究者可用不同的方法来评价社会身份复杂性，应考虑身份复杂性的各种先例和后果。^① 按照他们的逻辑，本文研究社会身份复杂性概念，以英国的华人移民为焦点群体。

三、结果与讨论

(一) 受访者基本信息

笔者在英国采访了 13 位受访者，请见下表：

编号	年龄 (岁)	性别	教育 水平	宗教	国籍	独生子	家乡	现居地	何时到 英国 (年)	在英 职业	往返中英 频率 (次/年)	获英 国永 居权
1	29	女	硕士	基督教	中国	是	南京	圣安德鲁斯	2005	会计	1	否
2	26	女	硕士	无	中国	是	杭州	爱丁堡	2008	翻译	1	否
3	31	男	硕士	无	中国	是	四川	圣安德鲁斯	2003	经商	1	是
4	33	男	本科	无	中国	是	广西	伦敦	1998	工程师	1	是
5	36	男	硕士	无	中国	是	杭州	伦敦	2003	网络编辑	1—2	是
6	36	女	硕士	基督教	中国	是	杭州	伦敦	2007	伦敦市政府职员	1—2	是
7	49	女	硕士	无	中国	是	上海	伦敦	1998	记者	4—5	是
8	31	男	硕士	无	英国	是	四川	伦敦	2005	金融从业者	极少	是

① Maykel Verkuytenand Borja Martinovic,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Immigrants’ Attitude toward the Host Na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8, No. 9, 2012, pp.1176-1177.

续表

编号	年龄 (岁)	性别	教育 水平	宗教	国籍	独生子	家乡	现居地	何时到 英国 (年)	在英 职业	往返中英 频率 (次/年)	获英 国永 居权
9	39	男	博士	无	中国	是	四川	诺丁汉	2007	大学 教授	3—4	否
10	32	女	硕士	无	中国	是	杭州	伦敦	2008	公关 经理	3—4	是
11	28	女	硕士	无	中国	是	福建	伦敦	2006	会计	1—2	否
12	29	女	硕士	无	中国	是	浙江	伦敦	2005	客户解决 方案咨 询师	1—2	否
13	27	男	本科	无	中国	否	广东	伦敦	2010	数据关系 经理	1	否

所选受访者在英国从事的职业相当多元，从网站编辑到记者、公关经理，从大学教授到伦敦市政厅职员，从传统职业如会计师和金融从业者到咨询师。大多数受访者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并选择留在英国工作。有两位受访者（记者和公关经理）是中国企业派至英国的职员，这类人在英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越来越多。

此外，在进行采访时，受访者在英国度过的累计时长从最短 2 年到最长 13 年不等。但是，只有 3 位受访者每年往返中国和英国 3 次以上，而其他受访者通常每年回国 1 次或很少回国。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已经成为英国的永久居民，其他受访者均表示有兴趣申请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当被问及是否会申请英国公民身份时，一半受访者明确地给予否定回答。

（二）多重身份

1. 中国文化身份

中国文化身份的标志在本项研究中简化为两个方面：孝道和汉语。笔者就此提出两个问题：（1）受访者将来会为了何种原因回中国？（2）受访者是否

坚持让孩子学习汉语？至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独生子女的身份是影响他们未来计划的一个因素。例如：

两三年之内回中国……主要原因是父母。我夫人也是独生子，
所以等我们的父母老了，我们必须回去。（3号受访者）

从调查可以看出，受访者父母的健康状况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将来照顾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大多表示5年之内仍然会留在英国。但是，未来10年他们决定在哪里生活或工作则在某种程度上受他们的中国文化身份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孝道。因此，作为独生子女，受访者强调照顾好他们的父母，表明他们认同中国传统价值观——孝道。

涉及中国文化身份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汉语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汉语。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孩子应该既学书面汉语，又学口头汉语，这一点从下面的访谈摘录可以看出：

我的小孩必须学中文。在他开始学讲话时，我会把他带回中国
一年，所以他必须学中文。（1号受访者）

是的，我会让他学习中文。他应当会说也会写中文。我还希望
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古典名著，这样他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
中国人。（12号受访者）

事实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汉语在受访者的个人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工作，大多数受访者在回家后仍然用汉语与家人交流。受访者希望他们的孩子把汉语作为母语来学，这可以视为身在英国的他们依然保留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上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孝道和汉语的认同，可以说明他们在移民到英国后仍保持着中国文化身份。

2. 中国国民身份

当受访者被问及在英国时的国家认同感时，除一位受访者外（已获得英国国籍），其余所有人均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一些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作为国家层面的强烈认同感，还有一些则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自己的中国背景作为客观事实来陈述。例如：

我一直当自己是中国人，只是在这里工作和做生意，和英国没有真正的感情，只是一位旅居者。（3号受访者）

我对伦敦的归属感比（作为整体的）英国强，但我仍然是中国人。（5号受访者）

我认为我更像是“世界公民”，不过追根溯源，我还是中国人。（7号受访者）

无论他们计划居于何处，无论他们对哪里有归属感，绝大多数受访者主观上都认同中国。此外，一些受访者在国际背景下体现自己的中国国民身份。客观上讲，他们现在没有或将来不会在中国生活。但是，他们主观上仍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3. 对英国的认同感

为了探究受访者以何种方式认同英国，笔者向受访者提出了获得英国国籍以及归属感问题。总体上，他们的回答可以分为两类，即对居住地的认同和对伦敦的认同。有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英国没有归属感，但他们对在英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表示赞许；尽管他们并不认同英国，但他们对在英国生活的总体好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发现受访者的本地认同感。因此，这组受访者不认同整个英国，但认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另一组受访者则在被问及归属感的问题时立即给予明确的肯定回答。但是，他们的归属感紧密地依附于伦敦，而不是整个英国。一位受访者相当直率地表示她是“百分之百的伦敦人”：

我一点也不英国化。我认为我是百分之百的伦敦人。我想借用

一句话，“如果你在纽约，人们期许你成为一名纽约人，但是当你在伦敦，人们期许你做你自己”，这是我在伦敦的总体感受。

（6号受访者）

因此，这一焦点群体对英国的总体认同感逊于他们对居住地的认同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几位受访者强烈认同伦敦，而不强烈认同英国。在表达归属感时，他们将伦敦与英国分离开来。除了中国国民身份和文化身份外，这一焦点群体的本地身份，尤其是他们对伦敦的本地认同感，也很突出。

综上，通过对采访信息按主题编码，共归纳出焦点群体对三种身份的自我认知：中国文化认同、中国国民身份认同和地方身份认同。这三种身份一起构成了该焦点群体的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因此满足了社会身份复杂性的前提：受访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多重社会身份。

（三）社会经历与社会身份复杂性

为了研究焦点群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根据前文提及的理论框架，笔者重点考察了受访者在英国的实际社会经历。洛卡斯和布瑞伟认为，一个人社会经历的复杂性是影响其身份复杂性的一个因素。^①生活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有望提高社会身份复杂性。在本文中，为了便于探讨，社会经历简化为受访者在英国的工作经历。笔者根据该焦点群体工作环境的实际多样性来划分他们在英国的经历。一组受访者在相当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工作，其中8号受访者曾分别供职于英国的银行和对冲基金公司，他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8号受访者是焦点群体中唯一获得英国国籍的人，同时他也不否认自己的中国背景，他的社会身份复杂性相对较高。

其他几位受访者也在英国或多或少有复杂的社会经历，但他们社会身份复杂性的程度不同。另一组受访者在不那么复杂的或同质性的环境中工作，华为

^① Sonia Roccas and Marilynn B. Brewer,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6, No. 2, 2002, p. 96.

的职员这样说：

目前我在华为英国的一家分公司工作。我的工作主要围绕公
关。因为是中国公司，职员都是从中国派来的，所以我的同事都是
中国人。 (10号受访者)

由于其直接工作环境的同质性，10号受访者的社会身份复杂性低于8号
受访者。这是因为，尽管她也在伦敦这个文化多元的国际性城市生活，但是
她实际接触到的文化多样性低于8号受访者。几位受访者在这方面与她相似，
例如：

我是一名会计，主要与报告和数据打交道，所以这对语言的要
求并不高。总之，我不需要每天和人打交道。 (1号受访者)

因此，生活在一个多样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可能并不一定就有形成复杂身份
的条件。不同受访者对多元文化环境有不同的感受，这取决于他们实际接触到的
多样性。此外，关于多元文化的社会规范，也可能减少生活于多元文化的社
会对社会身份复杂性的影响。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生活时，他们构成的
文化群体通常在力量上是不均等的。“一些主导群体明显是主张社会同化的，
希望促进国家形成单一文化，而其他人士则是融合主义者，明确鼓励保持非主导
群体的文化传统”。^① 伦敦的融合规范即是如此，鼓励非主导群体保持文化传
统。对6号受访者来说，就是需要通过融合来塑造“百分之百的伦敦人”。融
合主义思想鼓励各种民族文化群体表现其多样性，提升其重要性。因此，当融
合主义规范占据上风时，社会成员更可能意识到他们的民族、种族或文化群体
与他们所属的其他群体并不重叠。当6号受访者表示其是“百分之百的伦敦人”

^① Sonia Roccas and Marilyn B. Brewer,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6, No. 2, 2002, p. 96.

时，她不是指做一个伦敦人就要摒弃她的其他独特身份。相反，她认为要成为伦敦人就要属于多个群体，融合多重身份，做自己。

（四）具体情境中的社会身份复杂性

除了对社会身份复杂性的程度有影响的长期因素外，情境因素也可能导致个体的多重身份表征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在遇到突如其来的外群体威胁或在高压状态下，通常采取复杂性较高的“区分式表征”的个体可能会临时选择复杂性较低的“主导式表征”。4号受访者回想了自己最近的经历，如下：

那天一个我们的同事……他就说：“所有这些场馆（伦敦2012奥运会场馆）我们只花了6亿。”（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然后他又说：“你们中国，北京，花了60亿。”然后我就回答了他一句说：“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没钱就别花呗。”（4号受访者）

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听到他英国同事的评论时，其中国国民身份立即凸显出来。对4号受访者来说，这是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使得其中国国民身份受到威胁。受访者立即为其国家辩护，将自己的国民身份置于自己所有多重身份的中心位置。在那个时刻，他搁置了将其和其同事归为工程师的职业身份和作为伦敦居民的本地身份。但是，4号受访者的临时性反应可能并不表明其表征自己的复杂身份时总是采取“主导方式”，即他的中国国民身份始终位居首位。因为，他同时表示：

我的意思是，不同文化的人都有思维惯性，英国人和中国人都。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敌意，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4号受访者）

从以上4号受访者的进一步阐述可以看出，通常情况下，他不太可能把任何外群体的评论当做威胁，并且作为伦敦地铁局的工程师，他和他的同事共

同拥有工程师这一职业身份，同时他也是伦敦市民，对伦敦有高度认同，他的长期社会身份复杂性还是较高的。4号受访者之所以突然选择复杂性较低的“主导式”表征方式，是因为情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代表他一直以来便是如此。

这一例子已经将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置于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背景中，以真实生活中的例子讲述和解释了情境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多重身份表征。这个例子避免了以问卷形式的单一性调查导致的统计数据失真，即，受访者在这一时刻做出的选择并不能代表其长期稳定的认同问题。

（五）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对英国其他群体的认知

1. 对在英香港人的认知

受访者对在英香港人的认知可归为两种不同的重叠：重叠的国民身份和重叠的文化身份。第一种重叠描述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如何在国民身份方面将香港人视为属于外群体的。

例如，12号受访者的职业为客户解决方案顾问，她的同事“都是外国人”（12号受访者），其社会身份复杂性较高。她对那些不认同中国的香港人持冷静理智的看法。只要同事尊重她，她就不会以恶意来揣测他们。她感觉到她自己和一些香港人的国民身份是不重叠的，但是在与外群体的成员交往时她仍把尊重放在首位。正是因为她的社会身份复杂性相对较高，她对外群体的认识才趋于开放和温和，这一逻辑在本文理论框架中有阐述。

另一种重叠表明受访者在文化身份方面如何看待外群体：

整体上我感觉他们对自己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无所谓。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每个人对此都持开放态度。就我而言，我是广东人，我觉得我自己更接近香港文化，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挺有共同之处的，所以我不觉得我和他们有多大差别。（13号受访者）

13号受访者是一家美国公司的数据关系经理。同样，他认为在英香港人

普遍较好，较为开放。他的这一开放态度不仅与他较高的社会身份复杂性有关，也与他香港的文化认同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对在英香港人的认知是基于文化重叠而言的。

2. 对出生于英国的华人的认知

大多数受访者着意表示，伦敦的英国本地人较少，人们具有各种背景。他们还表示没有英国主流文化，所以他们倾向避免用“英国人”来指代他们的同事，避免谈论某人的行为方式整体上是英式的。他们认为，在伦敦生活的人们是不同的。有趣的是，一旦他们谈起出生于英国的华人，他们就不再强调多样性了。他们往往把出生于英国的华人视为完全的英国人，受访者这样说：

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英国人，包括那些很小就移民到英国的人。他们的长相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其实是英国人，他们不讲中文，第一次见面他们都讲英文，他们认识的所有人都是英国人。他们的行为举止、社交圈都表明他们是英国人。

（11号受访者）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出生于英国的华人以英国人的方式行事，意味着他们具有英式风格。为什么该焦点群体在谈论同事和在英出生的华人时，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英国人”一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在前面那种情况下，受访者试图寻找其与伦敦其他居民的共同点，即所有人都是不同的，而不同于其他群体又是这些群体仅有的共同之处。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受访者在成员被认为彼此相似的群体中（对出生于英国的华人的称呼本身就具有中国背景）寻找不同点。因此，他们需要突出“典型的英式行为”来将出生于英国的华人与这个群体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虽然受访者往往将自己与出生于英国的华人区别开来，即没有身份认同，但他们仍然对出生于英国的华人持开放态度，抱有好感。

四、结尾

从 2000 年左右,英国的华人移民圈开始发生新一轮的结构变化。在英华人社会不再只是依靠开餐馆来维持生计,他们开始向英国的其他行业渗透。本文在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框架下,对这一群体的多样社会身份表征和其对英国其他群体的认知做了探讨,为今后进一步量化和科学采样研究做出了铺垫。此外,以下几点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考虑到的因素:(1)独生子女现象并不只是中国有,所以这一因素的代表性不是很突出,因此,今后的研究在标定文化身份时可以选择其他概念;(2)关于英国的认同感问题,伦敦这个城市具有特殊性,如果换做英国的其他城市,调查结果是否一样,这就需要扩大取样范围来进一步研究;(3)本文只讨论了三种社会身份,并且其中中国文化身份和中国国民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融合状态的,并不能很充分地体现出受访者对自己不同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形式。后续研究可以对职业身份、性别身份等其他不同社会身份进行认同研究。